

制度逻辑视角下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路径研究

——基于动态 QCA 的分析

武永超¹, 王磊²

(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陕西 咸阳 712100; 2. 中央民族大学 管理学院, 北京 100081)

摘要: 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对于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如何通过优化制度组合以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立足制度逻辑理论和组态思维, 基于自主建构的分析框架, 以中国省级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案例为样本, 利用动态 QCA 法, 探讨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种制度逻辑下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路径及其动态演化。研究发现: 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需要政府、市场以及社会三方制度要素协同释放效用, 单一条件均无法独立支撑培育目标的实现; 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存在三种等效路径, 分别为市场牵引型、社会诱致型、“政府—市场”双轮驱动型, 尚未出现三方协同型的理想化路径; 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具有明显的时间效应和区域差异。除市场牵引型外, 其余两条路径的解释力表现出稳定性和渐强趋势。多数地区倾向选择“政府—市场”双轮驱动型路径培育新质生产力。研究有助于深化对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中不同制度逻辑和关系的认识, 并为解决培育进程面临的时空问题提供政策启示。

关键词: 农业新质生产力; 路径; 制度逻辑理论; 动态 QCA

中图分类号: F3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511 (2025) 03-0075-10

DOI: 10.19808/j.cnki.41-1408/F.2025.0027

一、引言

农业新质生产力指的是集合农业劳动者、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三大要素, 以数字化和智能化为主线, 以涉农技术革命性突破为引擎, 以农业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为依归, 实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高质量发展的农业先进生产力质态^[1-2]。2025 年 2 月,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农业作为传统产业、基础产业, 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前景最广阔的产业领域。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对于推进农业现代化、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加快农业强国建设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尽管现阶段农业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初具雏形, 然而受制于各类环境因素, 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仍然面临农业科技支撑不足、产业基础和抗风险能力薄弱、新质劳动力短缺等诸多挑战。因此, 如何加快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成为破解农业生产发展困境、助力农业高质量发展亟待解决的一道关键命题。

以过程论的观点来看, 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是一个涉及政府、农业企业、涉农社团、农民等多元主体和政策、市场、需求多种复杂因素交互作用的过程^[3]。每个主体都有自己独特的行为动机、逻辑和模式, 对于所能支配要素的使用偏好以及配置方式也千差万别。与此同时, 各主体在对作用对象施加影响的过程中, 还会与其他主体建立以冲突或合作为底色的交互关系。这种差异性和互动性使得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过程往往呈现出鲜明的“黑箱”性和模糊性。而制度逻辑理论为廓清上述问题创造了一种可能性。作为一种元理论框架, 制度逻辑理论主张社会(广义)中不同领域或层面会遵循一套由相对稳定的规则和信念构成的逻辑。这些逻辑为主体(涵盖个体或组织)在特定环境中的行为提供了认知框架和行动指南, 塑造了其对该问题的感知、目标的设定、资源的获取与配置以及与其他主体的互动方式^[4]。在此基础上, 制度逻辑理论

收稿日期: 2024-09-17

基金项目: 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2024F013); 陕西省创新能力支撑计划项目(2025KG-YBXM-027)

作者简介: 武永超(1990—), 男, 安徽阜阳人, 博士,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农林经济管理。王磊(1988—), 男, 新疆库尔勒人, 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乡村治理。

能够整合宏观、中观和微观等不同层次的分析,强调从整体和系统的角度综合考量不同主体和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揭示不同制度逻辑的独特运作方式^[5]。这些理论解释优势,为研究全面把握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过程的错综性和系统性,洞悉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内在机理提供了一个恰当的分析视角。有鉴于此,本文基于制度逻辑理论,从时空维度探索多种制度逻辑下的相关要素与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间的复杂因果关系,尝试对以下具体问题进行回应。第一,助推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制度要素包含哪些?第二,这些要素组合会形成哪些培育路径?第三,不同培育路径在时间与地区维度上呈现出哪些动态特征?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一) 文献综述

随着国家对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问题重视程度的持续加码,探讨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影响因素及机制也相应地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现有文献主要存在三条研究进路:一是影响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因素。学者侧重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视角探析左右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效果的关键要件。宏观层面关注国家制度安排等背景性变量对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塑造,认为政策支持、科技创新投入、经济发展模式、社会文化等环境要素会对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形成明显的推拉效应^[6-8]。中观层面揭示产业部门与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关系,该层面的研究将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组织创新、市场竞争格局、产业组织规模和力量等要素视为制衡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的核心要件^[9-11]。微观层面强调以农户、合作社为代表的农业生产和经营群体是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的中坚力量^[12-13],认为生产者素质和观念、经营者组织化程度、资源供给和配置能力等因素会对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产生基础性影响^[14-16]。二是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的促进机制。既有文献通常在对相关影响因素识别前提下,探讨各结构性要素的运作如何驱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类机制:其一,资源撬动机制,认为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支持等一系列策略和手段,以有限的资源投入来吸引、整合和调动更多的资源,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价值最大化,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17-18];其二,主体凝聚机制,通过利益共享、契约协作、风险共担等方式,将不同的主体凝聚在一起,形成合力,共同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8];其三,监督评估机制,旨在通过质量监督、信息透明、动态跟踪等手段为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过程顺利进行提供支撑和保障^[19]。三是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对策建议。学者对照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借鉴理论智慧和实践经验,提出一系列规范化的改进措施或方案。这些对策建议主要关注两方面内容:一方面致力于消除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种种阻碍^[3],这些阻力既有来自劳动资料、劳动者、劳动对象内部,也有来源于支持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所依存的外部环境^[20]。克服上述阻力能够确保农业新质生产力实现正常发展的最低目标。另一方面则是关注如何促进农业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强调通过对发展要素调适以及资源持续追加,为农业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跃升创造适宜条件^[21-22]。

总体来看,既往研究从影响因素、促进机制和对策等维度对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展开了诸多有益探索,具有重要启示价值,但仍存在优化空间。一方面,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的本质是多个制度要素差异化协同配置的结果,而既有研究多是立足独立性视角,侧重分析单个制度要素对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独立驱动效应,难以反映出多重制度要素与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之间的并发因果关系。另一方面,尽管已有学者对农业新质力培育机制和过程进行了探讨,但分析面临“时间盲区”问题,忽略了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动态性,导致研究结论的推广意义和指导价值大打折扣。鉴于此,本文尝试从制度逻辑理论视角切入,采取动态QCA方法,利用2012—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政府逻辑、市场逻辑和社会逻辑三个维度探究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多元路径及其动态演化规律。相比于以往研究,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借鉴制度逻辑理论,结合中国实践情境,构建了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的整合性分析框架,不仅揭示了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复杂因果关系,还拓展了制度逻辑理论在多场景中的解释边界。第二,将动态QCA方法运用到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问题研究中,不仅弥补了制度逻辑理论静态分析的不足,为制度逻辑动态性研究提供新思路,还能够反映组态间的差异性现象,为针对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个性化建议的输出提供了可能。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制度逻辑理论发源于新制度主义，由 Friedland 和 Alford 最早提出并引入组织和管理理论分析之中^[23]。该理论将制度逻辑描述为一个包含价值观、规范期望、文化象征符号、物质实践的要素系统，个体、团体和组织依据其对自身日常行为进行评判，并赋予后者特定意义^[24]。在此基础上，制度逻辑理论认为制度具有多元性，涉及市场、社区、家族、国家等层面，每种制度均存在一种核心逻辑。早期的制度逻辑研究重点关注单一主导制度逻辑对组织或个体行为的支配性影响^[4]。后进探讨则提出多元制度逻辑和制度复杂性的观点，主张同一制度环境内蕴含多种可分的制度逻辑，制度逻辑之间存在冲突或互补的关系，并对受体日常运作和战略决策施加联合影响^[25]。国内学者更多地将该理论应用于企业创新和创业实践的分析当中。基于中国情境进一步将制度逻辑划分为政府（Government，G）、市场（Market，M）和社会（Society，S）三类，并尝试将其与组态分析进行结合，用于解释城市创业活跃度、经济高质量发展等现象^[26]。因循上述观点，本文认为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作为一种行为过程，受到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种制度逻辑的综合作用。

然而，作为一种植根于西方情境的理论，将制度逻辑理论应用到农业新质生产力领域存在一定局限。首先，制度逻辑理论偏重阐述不同制度逻辑对结果的线性影响和“净效应”，难以解释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过程中存在的多因素交互效应。其次，制度逻辑理论往往关注特定制度逻辑下的一般性规律，较难发现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环节不同因素组合可能导致相同结果的等效现象。最后，制度逻辑理论是基于企业制度背景构建的宏观理论产物，可能导致在解释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主题时出现适应力不足的问题。而组态思维在揭示复杂因果关系以及等效现象方面的优势恰能够有效弥补制度逻辑理论存在的解释缺憾。鉴于此，本文在制度逻辑理论基础上引入组态思维，结合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实践情境，构建出一个包含“政府—市场—社会”三个维度的组态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探讨影响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制度要素组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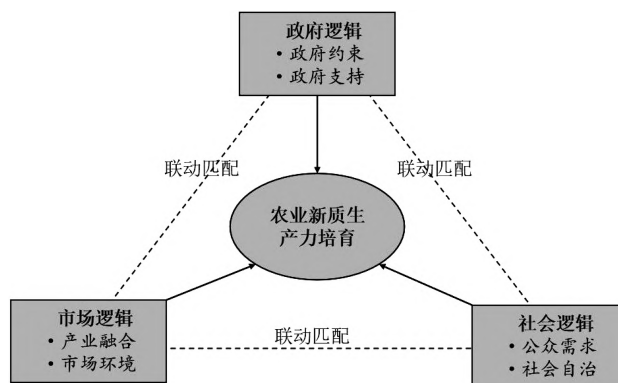


图1 分析框架

（1）政府逻辑（G逻辑）。政府作为一种能够调动体制内外力量对公共事务进行管控的权威性组织体系，主要利用强制权力干预和实现资源的调控^[27]。实际运作中，政府逻辑主要借助约束和支持两种方式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前者表现为政府出台农业产业规制政策，抬高高耗能和高排放涉农企业的生产门槛和成本，倒逼其改变生产和经营传统，开发和生产高附加值、低能耗农产品，发展有机、生态、高效农业，从而促进农业生产结构绿色转型和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后者表现为政府制定财政补助和经济激励计划，促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新型农机产品研发和推广，改善农业劳动者的素质能力，从而为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28-29]。

（2）市场逻辑（M逻辑）。市场逻辑的本质是通过打破产业界限，让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依据效率原则和市场机制，流向更有潜力的领域，完成价值创造^[30]。在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过程中，市场逻辑突出表现为借助产业融合和市场环境两种方式实现各类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前者表现为以农业为依托，提升高新技术在农业产业中的渗透度，将各类生产资源和要素进行跨产业集约化配置，使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和销售、餐饮、休闲以及其他服务业有机整合，实现三次产业链之间的联动与延伸，从而带来农业生产方式和生产效率的深刻变革^[31]。后者体现为通过提供高效透明便捷的交易环境，为农产品销售创造广

泛的交易机会,降低其制度性交易成本,激发农业生产主体和经营主体为获取超高净利润采取更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方式,以此带动农业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升。

(3) 社会逻辑(S逻辑)。社会是一种基于自我保护,以志愿性为动力,自主、自发调节和分配社会资源的制度工具^[32]。通常而言,社会逻辑会通过引导公众需求和提升自治能力两种方式促进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前者主要体现为农户对提升农业生产率和增收的强烈需求,会给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机会窗口,一方面传导给政府部门,促使其采取调控手段加速农业生产力变革,另一方面给市场部门的生产和销售活动提供方向引领,间接提升农业生产率。除上述外,农户需求也会作用于其自身,增强其学习农业知识、改良农业技术和使用新型生产工具的意愿。后者主要表现为充分调动农村社会自主性和参与性,主动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多元化、专业化、市场化的服务组织,积极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进而推动传统农业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

三、研究设计

(一) 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定性比较分析(QCA)剖析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路径。QCA最初由Ragin提出,是一种基于布尔代数、融合定性定量思维的组态分析方法,旨在探究若干前因条件与结果变量之间的多重因果关系^[33]。传统的QCA在分析上存在时间盲区,仅能依托截面数据做静态分析,难以对时间维度上的组态演化问题进行解读。为此,Garcia-Castro和Ariño提出了基于面板数据的动态QCA方法,它能够利用一致性指标捕捉组态的时间效应和个体效应^[34]。

(二) 样本数据

基于案例内部异质性和数据可用性原则,本文选取2012—2020年中国30个省级区域(不含西藏以及港澳台地区)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案例作为研究样本。前因条件和结果变量所使用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下同)政府网站和统计年鉴(公报)。数字普惠金融投资指数和数字普惠金融移动支付指数来自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市场化指数来自《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部分缺失值采取插值法补齐。

(三) 变量测度

1. 结果变量

农业新质生产力水平。现有文献多采取综合化的指标体系来测度农业新质生产力水平。本文借鉴朱迪和叶林祥的测度思路^[35],立足农业新质生产力理论内涵,兼顾相关性和数据可获得性原则,构建农业新质生产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含农业劳动者、农业劳动对象和农业劳动资料3个维度、劳动者素养等7个一级指标以及农民受教育程度等11个二级指标,利用熵值法可测算得出综合指数,能够全面反映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整体状态。

2. 前因条件

(1) 政府约束。相关文献观点指出,农业新质生产力是一种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的生产力。这种绿色属性势必使得环境规制作为政府约束的一种最直接形式作用于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过程。为此,本文选取环境规制来衡量表征政府约束水平。环境规制强度的测度主要用各省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额与工业增加值之比表示^[36]。(2) 政府支持。采取地方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衡量。(3) 市场环境。选用市场化指数来衡量市场环境^[37]。该指数包含政府与市场关系、非国有经济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五个分项。(4) 产业融合。借鉴王丽纳和李玉山构建的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指数进行表示^[38]。该指数由农业产业链延伸、农业多功能性发挥等3个一级指标和农产品加工业比重等5个二级指标构成。(5) 公众需求。借鉴Ma的测度思路^[39],选取地区乡村人口数量表示。(6) 社会自治。采取每万人乡村人口拥有的地区自治组织数量表示。

(四) 变量校准

校准就是将原始数据转化为隶属度的过程。本文采取直接校准法对前因条件和结果变量进行校准。根据变量在样本总体中的分布特征,将 95%、50% 以及 5% 分位数值分别作为完全隶属、交叉点以及完全不隶属的校准锚点。各变量的测量指标描述与校准信息如表 1 所示。

表 1 描述性统计与校准

变量	完全隶属	校准		均值	描述性统计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农业新质生产力	0.472	0.202	0.097	0.224	0.102	0.076	0.529
政府约束	0.009	0.002	0.001	0.004	0.004	0.000	0.031
政府支持	0.172	0.116	0.053	0.115	0.033	0.041	0.204
市场环境	10.900	8.240	4.895	8.040	1.860	3.359	11.934
产业融合	0.388	0.139	0.045	0.167	0.109	0.022	0.554
公众需求	4396.350	1609.075	255.900	1905.053	1281.537	212.160	5530.000
社会自治	8.065	4.405	2.388	4.727	1.739	2.085	8.668

四、实证分析

(一) 必要条件分析

首先采取 QCA 法进行必要条件分析。当单个前因条件的汇总一致性水平大于 0.9 时,则可以判断该变量为必要条件。同时就面板数据分析而言,当一致性调整距离小于 0.2 时,则意味着前因条件具有较高的稳定性^[34]。由结果可知,6 个前因条件的汇总一致性水平均小于 0.9,表明并不存在导致农业新质生产力产生的必要性条件。但所有条件的组内一致性调整距离均高于 0.2,表明各地在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的软硬件方面存在显著差异^[40]。同时,政府约束和产业融合的组间一致性调整距离高于 0.2,需要进一步考察。组间分析结果显示,除“~政府约束→高农业新质生产力”情况外,其余情况的一致性均小于 0.9,故不存在必要性关系。再借助 X-Y 散点图检验后发现,上述情况亦未通过必要条件检验。综合以上分析结果表明,全部前因条件均不严格构成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必要条件,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需要多重制度要素联合作用。

(二) 组态分析

运用 R 语言的 SetMethods 包进行组态分析。参照相关文献做法^[41],将原始一致性水平阈值、PRI 和频数阈值分别设置为 0.8、0.7、2,最终获得产生高农业新质生产力的三种制度组态(如表 2 所示)。

1. 汇总分析

通过表 2 可知:三种产生高结果的制度组态的总体一致性为 0.841,高于 0.8 的可接受值,说明符合这三种制度组态的案例中,有 84.1% 的案例呈现出较高的农业新质生产力水平;总体覆盖度为 0.718,说明三种组态可以揭示 71.8% 的农业新质生产力高水平案例;总体 PRI 为 0.674,表明有 67.4% 的可能性不会出现同因异果的问题。组态 G2 和组态 G1 的一致性调整距离均小于 0.2,组态 G3 的组内一致性调整距离虽略高于 0.2,但属于良性偏差,总体组态具有较好的解释力。接下来,本文对每种制度组态进行命名并借助理论进行补充分析。

(1) 市场牵引型。组态 G1 显示,以高产业融合、非高政府支持以及非高社会自治为核心条件的组合能够创造高水平的农业新质生产力。该路径的原始覆盖率和唯一覆盖率分别是 0.537 和 0.104,表明组态 G1 能够解释 53.7% 的案例,而其中 10.4% 的案例仅能被该组态所解释。就核心条件而言,该路径彰显了以产业融合为重要内容的市场逻辑在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过程中的牵引功能。因此,本文将组态 G1 命名为“市场牵引型”。该类路径的存在意味着,在政府投入和社会力量相对薄弱的农村地区,想要加快培育和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就需要更多地依赖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的牵引。而这种牵引作用具体表现为农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链延伸、农业主体引育、农业新型业态发展和集聚等一系列农业产业融合活动,它不仅能够带来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有效提升农业的生产效率,还能激发农业生产的活力和创造力,进而为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注入强劲动能。

该组态典型案例是重庆。作为全国首批 12 个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试点省市之一,早在 2016 年,重庆就出台了《关于加快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要构建农业和二产业交叉融合的

现代产业体系。之后,重庆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市场的引导作用,农业产业捷报频传。一方面,大力发展“小规模、多品种、高品质、好价钱”的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促进农业产业做大做强。截至2020年第四季度,全市累计发展柑橘、榨菜、柠檬等优势特色产业3100万亩,创建5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4个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20个重点现代农业产业园、市级智慧农业试验示范基地200个、家庭农场3.1万个^[42]。另一方面,促进农业“接二连三”,持续打造巴渝乡村旅游品牌,推动地区种植业、养殖业与乡村旅游等有效衔接。截至2020年底,全市累计创建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县12个、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点23个、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和美丽田园48个,认定市级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乡镇139个、示范村(社区)338个,打造乡村旅游线路200余条^[43]。一系列产业融合实践极大带动了地区农业产业增值和农民增收。截至2020年底,重庆第一产业增加值1803.33亿元,同比增长4.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361元,同比增长8.1%。

(2) 社会诱致型。组态G2显示,以高公众需求、非高政府支持和非高社会自治为核心条件,辅之以非高政府约束为边缘条件的组合路径可以加快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由该组态的原始覆盖度和唯一覆盖率可知,该类型路径能够解释44.6%的案例样本,其中10.5%的样本仅能被该路径所覆盖。就核心条件而言,该路径的特点是充分展现了以公众需求为代表的社会引致对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的积极意义。因此,本文将组态G2定名为“社会诱致型”。公众需求之所以能够发挥如此功用,其原因在于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的一个核心内驱动机就是要补上农民对农业生产率的巨大需求缺口,缓解农业产出和投入之间的矛盾,而这种使命也确立了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的正当性地位。从另一个角度具体看,农民对高效农业的追求会引发连锁效应,激励创新者开展旨在提升生产效率的农业技术研发活动,并诱导市场主体生产和推广更高技术含量和高绿色的农用资料。此外,农民对增收的渴望,也会极大激发其自身的主动意识和创造精神,推动其增强掌握和应用新型生产工具的能力。而新型生产工具和高素质的劳动者群体均是构成农业新质生产力不可或缺的要件。

该组态典型案例是安徽。作为传统的农业大省,安徽拥有着庞大的农村人口,农民对农业增产增收表现出强烈期待。数据显示,2020年安徽全省农业节水灌溉机械持有量和农用薄膜投入量分别比2012年增长8.2%和13.3%,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种需求倒逼安徽将发展重心放在农业提质增效上,从而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飞跃。截至2020年底,全省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4950万亩,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提高到81%,比2015年增加9.4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高9.8个百分点。农机总动力超过6800万千瓦,比2015年增长18.2%。这种需求也带来了农村市场的繁荣和农业技术创新的活跃。2020年,安徽全省乡村市场增速为3.9%,高于城镇1.5个百分点。2012—2022年,全省新增国家级农业科技创新平台14家、省部级农业科技创新平台131家^[44]。

(3) “政府—市场”双轮驱动型。组态G3显示,以高政府约束、高产业融合以及非高政府支持为核心条件的组合路径能够助力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该组合的原始覆盖度和唯一覆盖率分别是0.409和0.076,说明该条路径能够解释40.9%的地区案例,在剔除与其他组态路径共同部分后,该路径覆盖高农业新质生产力案例的比例为7.6%。就核心条件而言,该组态彰显了政府监管和产业市场两种力量合力在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因此本文将其赋名为“‘政府—市场’双轮驱动型”。深层次看,该类型路径之所以能够产生高水平的绩效结果,主要得益于市场和政府两种资源配置机制或制度安排基于优势互补的有效协同。一方面,高度融合且成熟的产业市场发展,可以带来农业生产要素资源的高效配置,加速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技术创新,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形成和壮大,这些要素均是实现生产力转化的必要前提。另一方面,高效有力的政府监管,可以有效缓解农业产业市场的外部性问题,防止产业市场失灵和扭曲,为其健康可持续发展营建了必需的环境和秩序,维护农业产业市场公平竞争,这些均为农业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提供了基础性保障。

该组态典型案例是山东。作为现代农业强省,山东省在农业生产力培植上历来重视将有效政府和有效市场有机结合。一方面,加大农业污染防控,倒逼农业资源利用提档升级。2018年,印发《山东省打好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作战方案(2018—2020年)》,明确指出要开展农业投入结构调整,推广高效、环保、绿色农业技术和农机装备,促进农业生产清洁化和产业模式生态化。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全省秸秆

综合利用率超过 94%，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高达 0.646，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接近 90%^[45]；高新科技和新兴业态农机具拥有量爆发式增长，谷物烘干机比 2015 年末增长 32.6%，农用航空器是 2015 年的 168 倍^[46]。另一方面，加快农业产业融合，壮大农业生产力根基。2017 年，山东出台《关于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指出要拓展农业多功能性，引导农业与休闲、旅游、电商等产业深度融合。2020 年，印发《山东省促进乡村产业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实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培育工程计划。截至 2020 年末，全省休闲农业经营主体达到 1.6 万家，淘宝镇 134 个，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到 360.3 亿元，农业数字经济超过 600 亿元^[47]。

表 2 实现高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组态

前因条件	高农业新质生产力		
	G1	G2	G3
政府约束		※	●
政府支持	○	○	○
市场环境			
产业融合	●		●
公众需求		●	
社会自治	○	○	
一致性	0.868	0.902	0.909
原始覆盖度	0.537	0.446	0.409
唯一覆盖度	0.104	0.105	0.076
组间一致性调整距离	0.031	0.056	0.038
组内一致性调整距离	0.196	0.190	0.219
总体 PRI		0.674	
总体一致性		0.841	
总体覆盖度		0.718	

注：● 表示核心条件存在，○ 表示核心条件缺失。▲ 表示边缘条件存在，※ 表示边缘条件缺失。

2. 组间分析

表 2 组间分析结果显示，三种路径的组间一致性调整距离均未高于 0.2，表明各条件组态不存在突出的时间效应。在此基础上，本文绘制了三种组态的组间一致性变化趋势图作进一步观察（如图 2 所示）。组态 G1 的组间一致性水平在 2013—2020 年间都低于 0.9，基本在 0.85—0.88 之间波动，表明这一组态在较长时间内并不能带来高农业新质生产力。一个可能性解释在于，以市场为主导的驱动方式具有较强的自发性和环境敏感度，其效力的发挥时刻受到市场供求关系、宏观背景以及竞争条件的影响，因而其对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助推效用表现出较强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性。相较而言，组态 G2 和组态 G3 的组间一致性水平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上升的趋向，并分别在 2018 年和 2016 年之后稳定在 0.9 以上，显示出较高的解释力，这意味着该两类组态可以在特定时期之后持续输出高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结果。究其原因，可能是新发展理念、乡村振兴战略和数字乡村建设等一系列顶层设计的提出和推动。如中共中央、国务院 2016 年印发的《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指出要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和农业绿色发展。201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要求切实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维护农民群众根本利益、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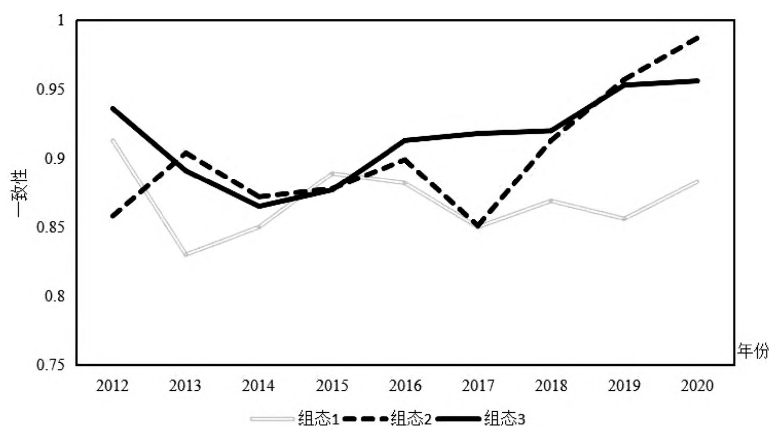


图 2 组态组间一致性变动

3. 组内分析

组内分析结果显示, 组态 G3 的组内一致性调整距离水平超过 0.2, 组态 G1 和 G2 的数值虽然符合低于 0.2 的阈值标准, 但也处于一种较高的水平, 这表明三种组态的解释力度存在不同程度的地区差异。为进一步揭示这种差异性, 本文绘制了三种组态的组内一致性水平分布图(如图 3 所示)。由图 3 结果观察发现: 其一, 中、西部地区在三种组态中的整体解释力度均明显低于东部地区。这当中甘肃最为典型, 其在三种组态的一致性均低于 0.75 的阈值, 表现出较低的解释力。其二, 组态 G3 是被最多地区选择的高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路径, 这意味着多数地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仍需依赖政府和市场两大传统主体力量共同发力。其三, 诸如北京、浙江等相当多的地区存在不止一条可以实现高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路径, 这可能得益于上述地区自身三种制度性要素相对完善和成熟, 能够支撑其以独立或协同的方式实现培育高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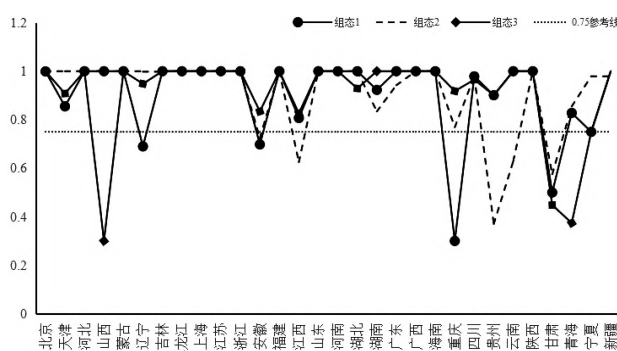


图 3 各组态组内一致性水平分布

(三) 稳健性检验

已有文献在进行稳健性检验时多采取提高一致性阈值、调整 PRI 一致性和案例频数三种方式^[39]。本文采取改变一致性阈值的策略, 将一致性阈值由 0.8 调整到 0.85, 再次进行汇总分析。检验结果显示, 组态结果和相关参数与原分析相差不大, 表明本文研究结论具有较高的稳健性。

五、结论与启示

(一) 研究结论

本文从“政府—市场—社会”制度逻辑视角切入, 基于 2012—2020 年中国 30 个省级面板数据, 运用动态 QCA 方法, 深入挖掘了政府约束等 6 个不同的制度要素对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协同影响机制路径, 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 必要条件分析发现, 在不同时点, 任一来自政府、市场和社会层面的制度性要素均不能独立构成助推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必要条件。第二, 组态分析表明, 现阶段, 存在三种能够产生高农业新质生产力结果的典型路径, 包含市场牵引型、社会诱致型以及“政府—市场”双轮驱动型, 尚未出现“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型的理想化路径。三种组态彰显出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制度路径具有“殊途同归”和“多重并发”的特征。第三, 组间分析表明, 三种制度路径均具有明显的时间效应。其中, 社会诱致型和“政府—市场”双轮驱动型两种制度路径随时间变化展现出愈来愈强的解释力和稳定性, 市场牵引型路径则在时序变化上表现出较强的动荡性。第四, 组内分析表明, 经济发展基础较好区域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制度路径强健且具有非唯一性, 相比之下, 经济发展基础相对薄弱地区制度路径单一且培育效果尚不凸显, 绝大部分地区主要遵循“政府—市场”双轮驱动型路径推进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

(二) 政策启示

相关结论对于加快培育和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实践具有重要启示。首先, 强化在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过程中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种制度逻辑之间的联动协同。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应把握整体性和系统性原则, 清醒认识三种资源配置机制各自的优势和劣势, 取长补短。正确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 解决培育过程中多重影响因素之间的适配问题。最大程度消解各制度要素之间的内在张力, 实现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机社会的良性互动和步调和谐, 为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注入源源不断的推动力。其次, 充分重视市场对于

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的价值。必要性分析和组态分析结果均暗示了市场力量在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当中享有非比寻常的地位。为此,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应当毫不动摇地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一方面,促进农业产业融合。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多元融合发展,突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的带动作用。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密切农业各主体利益关系,实现各相关主体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积极培育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大力发展休闲农业、智慧农业、创意农业等新业态,探索打造农业产业综合体。另一方面,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的统一大市场,促进农业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持续壮大市场主体,出台相关激励举措充分发挥农村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健全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体制机制,消除制度性堵点和壁垒,实现农业生产要素资源供给与需求的动态平衡。最后,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应当树立权变理念。组间和组内分析结果折射出,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过程带有极强的时变性和情境性,需要因时而变,随事而制。因此,各地在加快培育和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时,要坚决防止“一刀切”和照搬照抄的倾向,坚持因地制宜和精准分类,采取错位发展策略,弄清地区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市场条件等发展底数,紧密结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深挖区域独特资源。同时,注重向先进地区借鉴学习,探索并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实践路径。

参考文献

- [1] 姜长云. 农业新质生产力: 内涵特征、发展重点、面临制约和政策建议 [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3):1-17.
- [2] 罗必良, 耿鹏鹏. 农业新质生产力: 理论脉络、基本内核与提升路径 [J]. 农业经济问题, 2024(4):13-26.
- [3] 王殿安, 彭才根. 略论我国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培育 [J]. 农业经济, 2024(11):16-18.
- [4] 马正立, 赵玉胜. 制度逻辑理论建构: 基本原则与整体模型 [J]. 重庆社会科学, 2022(5):114-128.
- [5] 郝斌. 制度逻辑理论与中国实践: 对创业研究的启示 [J]. 管理学季刊, 2023(2):13-24.
- [6] 马玉丽, 周煜. 数字技术推进农业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实证研究 [J]. 华东经济管理, 2024(12):1-8.
- [7] 张丹华. 聚焦新质生产力展望农业新未来 [N]. 人民日报, 2024-10-30(10).
- [8] 解胜利, 吴理财. 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有为政府: 基于 C 县草莓产业发展的长时段考察 [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6):72-81.
- [9] 刘同山, 刘婕. 适度规模经营促进了农业新质生产力形成吗? 基于“生产力—生产方式—劳动生产率”框架的实证分析 [J]. 改革, 2024(10):44-61.
- [10] 洪银兴. 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思考 [J]. 农业经济问题, 2024(10):4-10.
- [11] 申云, 刘彦君, 李京蓉.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农业新质生产力提升的逻辑、障碍及路径 [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5):158-171.
- [12] 黄季焜. 农业新质生产力: 内涵与外延、潜力与挑战和发展思路 [J]. 中国农村观察, 2024(5):19-34.
- [13] 林青宁, 李京栋, 毛世平. 农业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理论逻辑、中国实践与着力重点 [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6):1-10.
- [14] 杨海华, 宋怡宁, 闫孟宇. 农业新质生产力之于新农人培育的应然要求与实践路径 [J]. 职教论坛, 2024(10):81-88.
- [15] 王莲. 以新质生产力引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24(19):39-42.
- [16] 郑兆峰, 高鸣. 农村人力资本助推新质生产力: 关键问题与政策优化 [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5):10-21.
- [17] 马贤磊, 范佳旭, 郭恩泽. 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现实条件与发展路径 [J]. 农村经济, 2024(9):11-20.
- [18] 唐萍萍, 任保平. 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决定性因素及其提升措施 [J]. 延边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4):52-62.
- [19] 肖华堂. 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 影响效应、现实挑战与应对策略 [J]. 农村经济, 2024(10):24-32.
- [20] 沈坤荣, 金童谣. 以农村全面深化改革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 [J]. 河北学刊, 2024(6):142-154.
- [21] 蒋昆, 胡豹. 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的理论逻辑、现实障碍与路径探索 [J]. 浙江农业科学, 2024(10):2245-2251.
- [22] 王丽双, 傅新红, 蒋浩, 等. 农业新质生产力测度、区域差异及耦合协调研究 [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25(1):55-64.
- [23] FRIEDLAND R, ALFORD R R. Bringing society back in: symbols, practices, and institutional contradictions, in W W Powell & P J DiMaggio (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232-263.
- [24] LOUNSBURY M, STEELE C W J, WANG M S, et al.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institutional logics: from tools to phenomena [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21(1): 261-280.
- [25] DUNN M B, JONES C. Institutional logics and institutional pluralism: the contestation of care and science logics in medical education, 1967-2005 [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010(1):114-149.
- [26] 方芳, 张立杰, 赵军. 制度组态视角下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多元路径探析: 基于动态 QCA 的面板数据分析 [J]. 中国农村经济, 2024(2):44-66.
- [27] 王世权, 王向淑. 科技人才集聚的区域治理归因: 基于多时段 QCA 的组态分析 [J]. 科学学研究, 2024(3):492-502.

- [28] 向书坚,宋丽影,郑瑞坤.从“三农”到“三生”:中国乡村“生产—生态—生活”演变规律与经验启示[J].统计学报,2024,5(4):1-12.
- [29] 杜志雄,田雅群.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关键领域、优化思路与着力重点[J].农村金融研究,2024,(5):3-14.
- [30] 程贵孙,孙武军.银行卡产业运作机制及其产业规制问题研究:基于双边市场理论视角[J].国际金融研究,2006(1):39-46.
- [31] 赵霞,韩一军,姜楠.农村三产融合:内涵界定、现实意义及驱动因素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17(4):49-57.
- [32] 傅小随.论社会志愿机制及其承载的第三次分配[J].特区实践与理论,2017(6):67-72.
- [33] 陈弘,孙一辰,熊春林.数字政府建设绩效提升的资源组合配置逻辑:基于我国 30 个重点城市面板数据的动态 QCA 分析[J].城市问题,2024(8):15-26.
- [34] GARCÍA-CASTRO R, ARIÑO M. A general approach to panel data set-theoretic research[J]. Journal of advances in management sciences & information systems, 2016(2):63-76.
- [35] 朱迪,叶林祥.中国农业新质生产力:水平测度与动态演变[J].统计与决策,2024(9):24-30.
- [36] 施美程,王勇.环境规制差异、行业特征与就业动态[J].南方经济,2016(7):48-62.
- [37] 孙早,刘李华,孙亚政.市场化程度、地方保护主义与 R&D 的溢出效应:来自中国工业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14(8):78-89.
- [38] 王丽纳,李玉山.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及其区域异质性分析[J].改革,2019(12):104-114.
- [39] MA L. Diffusion and assimilation of government microblogging: evidence from Chinese cities[J].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2014(2): 274-295.
- [40] 欧阳榕襄. TOE 框架下能源企业绿色创新的驱动因素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动态 QCA 分析[J].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1):1-8.
- [41] 曾凡军,陈永洲.什么样的数字治理生态能提高数字政府发展水平?基于生态视角的动态 QCA 分析[J].电子政务,2024(4):27-41.
- [42]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重庆立足山地特色 振兴乡村产业[EB/OL].(2020-11-07)[2024-07-08].https://www.moa.gov.cn/xw/qg/202011/t20201127_6357131.htm.
- [43] 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重庆市乡村休闲旅游业“十四五”规划》解读[EB/OL].(2021-12-24)[2024-08-12].http://nynw.cq.gov.cn/xxgk_161/zfxxgkml/zcwjld/wzjd/202112/t20211224_10229276.html.
- [44] 杨丹丹.为建设农业强省贡献科技力量:安徽农业科技创新十年成果回眸[N].农民日报,2023-02-09(3).
- [45] 山东省人民政府.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东省“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的通知[EB/OL].(2022-02-10)[2024-09-10].http://www.shandong.gov.cn/art/2022/2/10/art_100623_39912.html.
- [46]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山东省“十四五”农业机械化发展规划[EB/OL].(2023-02-17)[2024-08-09].http://www.njhs.moa.gov.cn/qcjhxtjd/202302/t20230216_6420832.htm.
- [47]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山东省“十四五”乡村产业发展规划[EB/OL].(2022-05-16)[2024-08-25].http://nync.shandong.gov.cn/zwgk/ghjh/202205/t20220516_3923029.html.

Research on the Cultivation Path of Agricultural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Logic: Analysis Based on Dynamic QCA

WU Yongchao¹, WANG Lei²

(1.College of Humanities & Social Development,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Xianyang 712100, China;

2.School of Management,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The proposal of agricultural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accelera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How to cultivate the agricultural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by optimizing the institutional combination is an important issue that urgently needs to be addressed. Based on the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logic and group thinking, and using independently constructed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is article uses the dynamic QCA method with the cases of cultivating agricultural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in China as samples to explore the cultivation path of agricultural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its dynamic evolution under the three institutional logic of government, market and society. The results are as below. Firstly, the cultivation of agricultural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requires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the three institutional elements of government, market and society, and that no single condition can independently support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ultivation objectives. Secondly, there are three equivalent path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agricultural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namely market-led paths, socially induced paths, and government-market-driven paths, with the idealized path of tripartite synergy yet to emerge. Finally, there are clear time effects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cultivation of agricultural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the two paths other than the market-driven path shows temporal stability and a gradual trend. Most regions tend to choose the government-market two-wheel-drive path to foster new quality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The study helps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different institutional logic and relationships in the cultivation of agricultural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provides policy insights to address the spatio-temporal problems facing the cultivation process.

Key words: agricultural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pathways; institutional logic theory; dynamic QCA

【责任编辑 张永芳】